

马尔库塞早期社会变迁理论探析

梁美妍

摘要 目前学术界对马尔库塞的关注和研究主要集中于他在文化层面上开展的社会批判,例如“单向度的人”、大拒绝战略等。但是,从最新出版的马尔库塞生前未发表的大量文献来看,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并不局限于文化批判,他在20世纪40-60年代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对现代技术和发达工业社会都做了深刻的研究和批判。一方面,马尔库塞在理论上考察了古代哲学中的社会变迁思想、现代理性主义社会变迁理论、现代社会学的社会变迁理论,特别是马克思的社会变迁理论;另一方面,他深刻揭示了现代技术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全面重塑、发达工业社会对社会变迁的遏制以及发挥技术的解放潜能推动发达工业社会深刻变迁可能的途径。马尔库塞早期的社会变迁理论对我们更加全面地把握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特别是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 马尔库塞;社会变迁;现代技术;发达工业社会

中图分类号 B516.5;C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2)03-0040-0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7YJC810007);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8SHB077)

著名哲学家和社会批判理论家马尔库塞,以其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和对激进社会运动的深刻影响,在20世纪的哲学和社会科学发展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因此也成为理论界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的对象之一。然而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马尔库塞的研究并不全面,主要集中于他的“单向度的人”、爱欲与文明、大拒绝战略等,即他在文化层面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但实际上,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内涵远为丰富,他的早期理论研究就定位于社会运行机制的层面,他对技术社会和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的社会变迁问题做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和现实分析。

在当今的学术语境中,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更多地呈现为一个社会学概念,在广义上它可以涵盖所有社会现象的变化,但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变迁应当特指社会的深层结构性的变革。从历史沿革来看,关于社会变迁的思考首先是哲学长期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思考的理论课题,只是到了相对晚近的时期,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社会变迁才为社会学、人类学等实证学科自觉关注。马尔库塞关于社会变迁问题的研究,在方法论上的突出特点是,他自觉地把哲学视角和社会学视角结合起来,因而既能避免单纯哲学思考的抽象性,又能防止纯粹社会学研究的过分实证化和细节化。马尔库塞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宏观视野来思考人类文明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又紧紧围绕现代技术条件下发达工业社会的现实批判,提出一种面向现实条件的社会变革理论。

马尔库塞的社会变迁理论之所以尚未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根本原因是他20世纪40-60年代的大量研究文献,特别是他在供职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情报局和国务院,从事反法西斯主义对策性研究时期的重要文献,在生前一直没有得到发表。直到十几年前,这些重要文献由著名理论家道格拉斯·凯尔

纳整理编辑出版了六卷本的《马尔库塞文集》^①，人们才有机会了解马尔库塞的早期理论研究。我们发现，早在20世纪40年代，马尔库塞就与法兰克福学派另一代表人物弗兰茨·纽曼(Franz Neumann，又译弗兰茨·诺依曼)合作完成了两个研究报告：《社会变迁学说简史》《社会变迁诸理论》；到了20世纪60年代，马尔库塞又单独写了《现代技术的一些社会含义》《技术社会中的社会变迁问题》《工业社会对社会变迁的遏制》等重要文章和演讲稿。不难看出，深入研究这些文献，特别是马尔库塞的社会变迁理论，无论是对全面把握他的思想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还是进一步彰显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的当代价值，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马尔库塞关于社会变迁问题的理论考察

马尔库塞社会批判理论的主旨是找到变革发达资本主义体制、实现根本性的社会转型的途径。为了这一现实批判目标，他认为首先需要对社会变迁问题做理论考察，特别是要厘清人类思想理论关于这一问题基本认识的演变。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和各个方面一直在发生各种变化，但是，哪些变化代表根本性的社会进步、社会变迁和社会变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课题，是人类精神在自己的发展中逐步探索和逐步澄清的问题。而且关于社会变迁问题的理论思考和价值追求本身就构成了现实社会变迁的重要内涵。因此，马尔库塞在自己理论生涯特别早的时期，就对社会变迁的理论和学说史做了专门的研究。他承认社会变迁的概念是我们这个时代才明确形成的理论成果，在这种意义上，这一概念和理论没有什么历史传统可言。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不能指望脱离先前的理论概念来理解社会变迁概念及其深远内涵，因为它正是从先前的理论概念中引申出来的，并且这些理论概念还在替代它们的学说中继续发挥效力”^[1](P126)。为此，马尔库塞和纽曼在《社会变迁学说简史》和《社会变迁诸理论》两份研究报告中，从学说史和理论形态等多视角对社会变迁问题做了理论考察。

在古代哲学特别是古希腊哲学中，已经包含着关于社会变迁问题不同程度和不同角度的思考。马尔库塞和纽曼认为，“古代哲人把社会变迁理解成是一个过程，它很大程度上可以等同于人类的生活过程，而人们可以根据它给予人类生活的可能性的多少来衡量这一过程的优劣得失”^[1](P113)。围绕着这样的问题，在古希腊哲学中存在着关于社会变迁的各种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观点。例如，以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等为代表的智者派，反对把城邦的、制度化的标准视为自然的法则，强调社会制度要服从个人的需要，因为社会制度是这些个体建立的，是起源于个人之间的契约的。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期，古希腊哲学开始比较集中地从国家政体、社会秩序和个人心灵或潜能的发展之间的关系上来理解社会的变迁。柏拉图的理想国家既不是乌托邦，也不是以暴力的方式对现有城邦的维持，他主要阐述在当时的条件下最能保证人的潜能发展的社会秩序形式，明确地把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建立与人的心灵结构联系起来。因此，到了这个时期，“伴随着希腊城邦的消亡，政治理论将人性的平等性与普遍性的概念合并在了一起，并把它当成了社会与政治组织的最高标准”^[1](P115)。在马尔库塞和纽曼看来，古希腊哲学关于社会变迁的思考不是以现代意义上相对独立的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因为在这些理论中，人、社会和自然并不是彼此分开的。但是，古希腊哲学中的这些思想具有重要的价值，不仅关于人的潜能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关系的认识对后来的社会变迁理论具有重要价值，而且把人、社会和自然作为统一的现实的思想，对当代受制于实证科学范式而形成的社会学、政治学等分立学科重新建立统一的社会变迁理论，或者形成关于社会变迁的总体性认识，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从社会变迁学说史演变的角度来看，古希腊哲学之后的一个重要时期是人类进入现代后的理性主义哲学。当然，在中世纪的宗教哲学中也包含着关于社会变迁的某种认知，其主要是在被造的尘世与上

^① 《马尔库塞文集》1-6卷的书名分别为《技术、战争与法西斯主义》《走向社会批判理论》《新左派与20世纪60年代》《艺术与解放》《哲学、精神分析与解放》和《马克思主义、革命与乌托邦》。

帝之城之间的静态等级秩序的视域中思考这一问题。但是,马尔库塞更加重视的是中世纪之后的理性化进程。他认为,使世俗社会脱离教会意识形态的关键步骤是由马基雅维利完成的,在后者那里,社会变迁问题被自觉地、公然地当成新兴民族国家的稳定性和完整性问题加以思考。当然,在马基雅维利那里,社会变迁成了一个实用的技术性问题,即如何支配大众以保证绝对主权利益的问题。伴随着人类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根本性转变历程,一种非常自觉的理性主义社会变迁理论贯穿近现代哲学。马尔库塞和纽曼指出,“随着现代社会的建立,理论的整个概念结构都发生了变化。理性主义取得了主导地位。科学技术的进步、世界市场的开放、所有国家对包罗万有的统一的生产体系的进一步屈服,以及建立在自由劳动原则基础上的社会,这一切都在声称以理性的、统一的概念来理解整个宇宙的理论中得到了反映。也就是说,自然与社会、地上与天上都受到相同的、不可避免的客观法则的支配,并且这些法则能够被人类理性的力量发现,还可以被用来对世界进行理性的统治”^[1](P119-120)。理性主义文化模式在近现代人类历史和社会运行中的主导地位是显而易见的,正如恩格斯在谈到法国启蒙运动和启蒙思想时指出的那样:这些思想家坚持用理性来衡量一切社会存在,“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2](P523)。因此,在关于人类社会的认识上,无论是经验论哲学家还是唯理论哲学家,无论是坚持人性本善和进步观念的乐观主义哲学家还是否认社会持续进步之可能性的悲观主义理论家,他们都要求重构新的自由理性的社会秩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种理性主义的社会变迁模式中,有两方面的要素占据重要的地位:一方面是理性原则及其按照技术理性重构的理性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是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这两方面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追求在随后到来的法国大革命等深刻的社会变迁中充分体现出来,并且二者之间的相互结合和内在张力,直到当代依旧是社会变迁理论所关注的根本性问题。

到了19世纪,社会变迁理论演变中的一个重大转折或者突破是真正社会学视域中的社会变迁理论的出现,这与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组织和社会体系的进一步理性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应当说,17、18世纪哲学视域的理性主义文化精神已经是现代性的深刻表征,而且这种理性主义社会变迁理论在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把握上具有很大的理论优势。但是,这种理论模式的很大局限在于其抽象性和普遍性特征,它在演变过程中很容易越来越远离真正的社会现实。这种理论和价值追求到了德国观念论,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里,已经演变成一种以绝对理念压抑个体自由,拒斥人民的自由决断,反对个人主义社会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一种强调国家对社会的绝对控制的理论。在这种背景下,很多与社会问题相关的理论都在努力挣脱黑格尔代表的这种普遍理性主义,其中就包括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学的兴起。马尔库塞和纽曼认为,“圣西门是第一位完全从对当时社会过程的经验分析中得出其学说的人,他是第一位拒绝接受任何先验的标准并且根据工业社会的发展趋势阐述变迁模式的人”^[1](P146-147)。在某种意义上,圣西门阐述的是一种实业(工业)决定论的社会理论。他认为工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引起社会变迁的唯一真实的要素,工业的每一步发展都会引起社会财富的增长和生产力的提高,进而决定社会的政治关系和政治制度的变化,从而使政府管理变成一种技术性的行政管理。此后,曾担任圣西门秘书的孔德创立了实证主义理论,最主要的是社会学。他继承了圣西门关于工业和技术的思想,认为建立在工业和科学发展基础之上的进步具有自然的、几乎是自动的特征,在这种意义上,他强调技术对社会的控制,旗帜鲜明地反对自由主义的理念。此外,斯宾塞等社会学家从不同角度阐述社会变迁问题,但在基本精神上还是比较接近的,都强调工业和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应当说,社会学的社会变迁理论的兴起和发展,有助于人们更加扎实地认识社会现实,特别是认识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基础地位,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理论抽象化问题。但是,这种理论也存在很大的局限,因为它的技术决定论思想充分认可对自由的压抑和对社会的操控,它把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理解为一种类似自然的过程,其理论带有调和论和静态论的特征,实际上否定了社会总体性变革与变迁的可能性。用马尔库塞和

纽曼的话来说，“实证主义社会变迁学说的动态特征只是一层稍微将其处于根本地位的静态概念掩盖起来的外壳”^[1](P124)。

在关于社会变迁问题的理论考察中，马尔库塞特别强调马克思理论的重要性。众所周知，马克思也曾深受圣西门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影响，他的唯物史观与孔德、斯宾塞等人的社会学大体是在同一个时代提出的，而且由于马克思对现实社会体制和社会运行的高度关注，他的理论也被视作一种社会学理论。但是，马克思的理论及孔德等人的社会学有着根本性的差别。马尔库塞认为，现代社会学已经切断了社会理论与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而马克思则依旧坚持哲学和社会学的紧密结合，这使他的社会变迁理论具有其他理论不可比拟的优势。一方面，在理论形态上，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观念，不再把社会理解为一种静态的体系，而是理解为一个不断变化和变迁的过程，一个由其内在结构的矛盾推动而发生深刻变革的过程，并且相信社会变迁会朝着更加自由和理性的方向发展。在这方面，马克思的社会变迁模式不仅是人类思想史上社会变迁理论的集大成，而且是一种理论创新，“可以说，该模式把先前诸学说的关键特征结合了起来，同时也对它们做了些改变。在其中，我们会发现理性主义的模式、进步的观念、文化整合、对社会进程的‘自然规律’的探寻。然而在新的概念框架中，所有这些观念呈现的是全然不同的意义”^[1](P156)。另一方面，从现实的维度来看，马克思像圣西门、孔德一样，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和大工业在人类社会运行中的基础性地位，但是他没有停留在对这些现代要素静态的和实证的分析上，而是在社会生产和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关系中对之进行批判的和超越的理解；同时，马克思肯定了社会矛盾运动的客观性，但又没有停留在一种机械决定论的立场，而是强调联合起来的工人的自由决断和革命行动的创造性和对历史进程的推动作用。因此，在这里，马克思“保留了黑格尔的诉求，即社会理论的每一个概念都必须以理解理性社会的总体性为目标”，而且对马克思而言，这种对社会总体性的批判理解，最终要落脚到这样一种认识：“社会变迁问题已不再是当前社会形式的问题，而是成了以社会主义的形式来取代这一社会形式的问题。”^[1](P123)

对社会变迁问题详细的历史和理论考察为马尔库塞更有针对性地研究现代社会的变迁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例如，以一种社会秩序和体系能够有效地保护和发挥人的自由、潜能和创造力作为衡量社会变迁的核心价值判断；高度关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现代社会的塑造和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以马克思开启的哲学与社会学视域相结合的社会变迁理论来审视和推动现代社会深层的革命性变迁，等等，这些都充分体现在马尔库塞关于现代技术社会和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之中。

二、马尔库塞关于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社会变迁问题的现实研究

马尔库塞之所以要对社会变迁问题做历史和理论的全方位考察，根本原因在于，他认为我们生活其中的现代社会，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发达工业社会，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一种深刻的社会变迁。在他看来，历史上大多数理性主义哲学家和实证主义社会学家们都一直相信，理性原则和现代技术的普遍运用会带来社会的持续进步和人的普遍自由、解放，然而这种愿景非但没有出现，现代人和现代社会反而陷入一种新的、更加深刻的危机——现代性危机——之中。的确，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现代科学技术在创造前所未有的社会财富和改善现代人的生存条件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极度恶化为代价的破坏性生产并没有消除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的贫富差别；从古希腊哲人就期许的那种能够发挥人的潜能的社会秩序，特别是马克思设想的能够使个体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并没有真正出现，反而是人陷入更加普遍的物化和异化之中；理性原则和现代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普遍运用，在提高管理和运行效率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技术管理和政治管理相结合的控制机制，这种机制对现代人进行了全面的操控。

问题在于，现代社会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依旧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呈现为一种明显不合理的社会形态，但是，它又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稳定状态，似乎很难发生真正深刻的、实质性的社会变

迁。马尔库塞认为,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与现代技术对人类社会日益增强的影响密切相关,因为发达工业社会本质上是一个技术社会。我们通常对社会变迁和社会革命的理解,主要是着眼于社会基本矛盾中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方面,而对其技术方面则关注不多。在马尔库塞看来,要把握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社会变迁的艰难性和可能性,必须对作为一个技术社会的现代工业社会有充分认识。

这正是马尔库塞早期社会批判理论研究的重要主题,特别体现在他20世纪60年代写的《现代技术的一些社会含义》《技术社会中的社会变迁问题》《工业社会对社会变迁的遏制》等文章或报告中。我们可以从马尔库塞丰富的论述中提炼出三方面的关键问题:现代技术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全面重塑;现代技术社会和工业社会遏制深刻社会变迁的内在机制;挖掘现代技术的解放潜能,推动发达工业社会变迁的可能途径。

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分析的基本出发点在于,现代技术对人类社会,特别是发达工业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全面的甚至是脱胎换骨式重塑,形成了全新的管理和操控系统。如果说,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主要是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和价值追求而存在,理性原则更多地体现为评判和衡量现存社会秩序和其他社会存在的尺度,那么,在发达工业条件下,技术和技术理性已经塑造了社会生产、社会生活和个体生存直接的组织方式和运行机制。马尔库塞认为,现代技术已经不再简单表现为各种具体的技术装置和技术流程,而是作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技术,是一种生产方式,是代表机器时代的工具、设备与发明物的总体,因此,它同时也是一种组织和维持(或改变)社会关系的方式,一种流行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的表现形式,一种控制与支配的工具”^[1](P50)。换言之,现代技术塑造了现代工业社会和工业文明的方方面面,“在这个社会中,技术并不是一个特别的因素和维度,但却是一切现实和现实化的先天条件”^[3](P53)。例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科学技术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的深度体现在它不断地将自然形式化,结果是实现了“自然的去自然化”,把原本的自然变成了由技术创造的“人造实体”。在人与社会关系方面,从生产领域到社会生活领域,现代技术更是全面地再生产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体系,它通过批量生产、批量分配和批量消费,把所有生产者、消费者和所有私人领域、共同领域都整合起来,控制起来,形成一种科学的、理性的现代生产管理体系。不仅如此,现代技术设备还被广泛运用于各种办公室、商场、街道、私人住宅和公寓之中,以一张众多技术单元相互协调、无所不在的技术之网,笼罩了个体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这样一来,一种全新的管理和操控体系得以建立,这是一种理性的、技术的管理体系,其典型的表现形式是日益膨胀的现代官僚制(科层制),“在生产和分配设备运转的过程中,技术操作与政治操作,技术控制与政治控制密不可分地纠缠在了一起”^[3](P57)。在这里,传统意义上的残酷剥削者和资本家让位于管理,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中的张力和冲突被技术关系缓解和覆盖。相应地,16、17世纪理性主义追求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也消失于冷冰冰的技术体系之中。人的行为与机器程序的理性结合在一起,“任何人都无力脱离这种使世界机械化、标准化的机构”^[1](P56)。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行为越理性,他就会越充满爱地致力于其理性的工作,他也就越无力抵抗这种理性所具有的令人沮丧的方面”^[1](P58)。

从上述关于现代技术对现代社会的全面重塑和全面操控,不难引出另一个与马尔库塞密切相关的结论,即建立在现代技术之上的发达工业社会全面拒斥和遏制深刻的社会变迁。在马尔库塞看来,当一种包罗万象的技术—政治管理体系把所有的主体和活动领域都纳入技术理性的管理之中时,要求变革现存社会体制的革命力量和批判思想也随之被抑制,甚至走向消失。因此,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变迁和社会革命的情势甚至不如马克思生活的年代。马尔库塞多维度地探讨这一问题,最重要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由现代技术全面重塑的发达工业社会形成了一种严密的技术控制体系,一种强有力的“顺从机制”,它把所有社会团体和社会力量,特别是传统的反对团体和力量都纳入现存体系之中。例如,像早期在劳工运动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劳工党派这样的“主要的反对阶层早早地就已经融入了机构”^[1](P62),反抗团体转变成了大众型政党,他们的领导也变成了大众的官僚;具有个性和主体性的个

人转变为放弃了自由和思想,没有个性的群众,即个体的大众化,“变成了一股维持机构实存的保守势力”^[1](P64);专家和工程师也变成行政领导者,拥有了团体内部的制度权力,“专家与工程师的等级地位根源于他们的能力与知识都用在了实现独裁上”^[1](P67)。另一方面,以现代技术为背景的普遍理性化和标准化在人类精神层面导致了思想的标准化和哲学批判精神的萎缩,结果是原本具有批判性的思想变成一种为现实辩护的力量,“受技术理性支配的思想的标准化也影响到了批判的真理价值”,“众多影响因素共同造成了批判思想的社会无能”^[1](P61,62)。

通过上述两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就来到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由现代技术全面塑造的发达工业社会,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还是有可能发生真正的、深刻的社会变革?从上述关于现代技术塑造的全新的技术管理和操控体系,以及发达工业社会对社会变迁的遏制机制来看,似乎前景令人悲观。然而,马尔库塞并没有持悲观主义立场,他依旧相信发达工业社会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生深刻变迁和变革的可能性,相信人类可以找到变革现存社会体制,扬弃现代人的普遍异化和物化,走向人的自由和自由人的共同体的具体途径。

首先,虽然马尔库塞反复强调发挥社会批判理论的批判潜能和恢复现代个体的自由意识对推动现代社会的变迁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他还是把很大的注意力放在如何在现代技术本身确立发达工业社会变迁的根基上。其中的根本之点在于,马尔库塞认为,现代技术具有两重性,既有压抑和束缚人的一面,也包含着解放的潜能,“技艺本身既能够助长专制主义,也可以促进自由;既能够招致匮乏,也可以带来富足;既能够延长劳作时间,也可以废除劳作”^[1](P51)。马尔库塞认为,现代技术内在地具有推动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解放潜能,主要体现在,当技术发展到一定节点上,其重心会从必要的物质生产转移到实现个体自由和社会民主化的方面。“技术过程有可能减少消耗在生产生活必需品上的时间和精力,同时匮乏的逐渐消除和竞争性职业的废除可以使自我从它的自然根源处生长起来。人们必须花费在维持生活上的必要时间和精力越少,就越可能使自我实现的领域‘个体化’。跨过必然王国,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区别就会把他们自身展现出来: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来思考、行动,讲他自己的语言,有他自己的情感,追随他自己的激情。”^[1](P77)

其次,马尔库塞不但充分肯定现代技术具有的解放潜能,还特别关注如何实现技术的解放潜能,切实推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性变革。马尔库塞在这些方面有不少设想,这里我们不可能全面展开论述,但可以提及一些要点。例如,就科学和技术本身而言,马尔库塞思考如何使现代技术能够尽可能地摆脱操控人和束缚人的负面作用,他认为有必要使科学和技术重塑自身的价值目标,转变为一种能够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新科学和新技术。在这里,他非常重视新技术特别是自动化的普遍运用对于人的必要劳动的减少和对个体自由时间的增加,“自动化将把必要劳动时间减到最少。那时,技术进步将超越有组织的稀缺王国,将不再局限于决定技术理性的支配性与剥削性的设备”^[3](P65)。同时他还强调科学的责任,他认为在原本的意义上,“科学的内在目的正是保护与改善人类的实存”^[4](P225)。换句话说,要改变现代社会条件下科学完全被外在目的和用途所左右的状况,“这里所要求的正是彻底重估目标和需求,改造压抑性和攻击性的政策与机构。改造科学只有在改造了的环境中才是可以想象的”^[4](P223)。就人的生存方式而言,马尔库塞特别关注如何消除消费社会和消费主义文化对现代人的负面影响,在这方面,不仅要防止沉溺于过度消费的人陷入更深的物化之中,而且还要防止发达工业社会通过物的中介对人的全面操控。他指出,“消除对各种乏味而又浪费性的东西的需要,消除对有利可图的、攻击性的自由的需要,很可能是解放的一个先决条件”^[3](P60),他甚至认为,在当代社会条件下,摆脱消费社会应当成为人的根本性的需求。“人对人的一切支配只有凭借对物的支配才能得到维系,因为人通过自身的劳动被束缚在了物上。易言之,如果人的存在已经不再在外在的、可让渡的物中被对象化了,不再自我消耗了,那么作为自由个人的人的相互承认就会向所有人敞开。”^[3](P99)只有技术本身和人的存在方式都发生深刻的变化,发达工业社会的深刻社会变革才可能真正发生。

三、马尔库塞社会变迁理论对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和社会革命思想的继承和丰富

从上述梳理和阐述可以看出,马尔库塞关于社会变迁问题的理论考察和关于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社会变迁问题的现实分析,包含着丰富的理论内涵。显而易见,对马尔库塞这些因相关文献长期没有发表而不被学术界知晓的思想和理论观念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最直接的意义上,通过对这些新发表的文献理论的研究,我们对马尔库塞以及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会形成更加全面的理解和把握。在相当长的时期,学术界了解和关注的主要是马尔库塞在文化批判层面阐发的社会批判思想,特别是“单向度的人”“大拒绝战略”等。同样,关于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人们也倾向于将之主要定位在文化批判层面上。虽然,霍克海默在法兰克福学派发展初期就提出要从哲学、心理学、政治经济学等多学科综合视野来研究马克思的思想,建构当代的社会批判理论,但实际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后来还是更多地偏重哲学、美学、文化层面的理论批判。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在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也被一些研究批评着,其中一种很主要的指责就是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局限于狭义的精神文化层面,缺乏坚实的社会分析基础。从这个视角来看,深入、系统地阐发马尔库塞早期的社会变迁理论,特别是他对技术社会和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思想具有重要的价值,不仅可以让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和重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同时也使我们原来理解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思想具有更扎实的根基。然而,我们这里重点不是分析法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本身,而是想从几个方面揭示马尔库塞社会变迁理论对我们在新时期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即唯物史观),特别是他的社会革命思想所具有的重要价值。

首先,马尔库塞关于社会变迁问题的理论考察和关于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进一步彰显了马克思思想的当代价值。在马尔库塞看来,马克思关于社会变迁的理解吸纳和综合了历史上各种社会变迁理论积极的理论内涵和文化价值,形成了辩证的革命理论。不仅如此,马尔库塞还认为,尽管人类进入发达工业社会之后,在社会发展和社会变迁方面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也包括很多马克思没有预料到的问题,但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基本判断和所持的批判的、革命的立场没有过时。例如,马尔库塞在谈到现代技术支撑的工业社会的批量生产时强调,这种生产在资本主义体制内具有破坏性,它加剧生态破坏、过度的消费、普遍的物化和贫富差别等问题。这些问题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是无法解决的。所以马尔库塞直到晚年依旧坚信:“生产性的破坏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框架下不可能被取消。因为,克服生产性的破坏原则与资本主义的组织原则相抵触。”^[4](P320)所以道格拉斯·凯尔纳强调:“尽管设想具体的革命趋势或运动十分艰难,马尔库塞还是坚称,社会主义的构建是当代激进政治的核心目标……他本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传统,事实上,他一生都没放弃过。”^[1](P41)

其次,马尔库塞不仅坚持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思想的基本立场,而且根据发达工业社会的新变化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视野。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关于现代技术的全面认识。马克思也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历史作用,他关于生产力的革命作用、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等理论,都包含着对工业和科学技术的深刻认识。但是,由于在马克思的时代,科学技术对社会的操控作用和对个体的束缚作用尚未充分显现出来,所以马克思更多的是把科学和工业视作“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5](P192),他倡导的社会革命也主要着眼于社会关系的维度。马尔库塞则发现了现代技术在重新塑造工业社会时具有的前所未有的操控能力,所以他在继承马克思关于社会关系维度的革命思想时,也通过技术理性的批判自觉地开启技术维度的革命批判。这一社会关系维度和技术维度相结合的社会革命设想无疑有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

再次,马尔库塞通过关于社会变迁问题的理论考察和现实分析,对社会历史理论和社会批判理论的方法论做了积极的探索。他在关于社会变迁学术史和社会变迁理论形态的考察中清楚地看到,无论是那种完全脱离实证研究和现实批判的理性主义哲学,还是那种拒斥哲学批判思维的纯粹实证的社会学,

都不可能建构起全面的社会变迁理论。因此,马尔库塞强调哲学和社会理论(社会学理论)的结合,强调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这也涉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发展中方法论或者理论范式的建设问题。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既反对脱离社会历史现实的抽象的理论反思,也反对摆脱哲学理性批判的纯粹静态的实证研究,他们总是强调理论批判和现实变革的紧密结合。这也正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强调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P502)尽管有马克思的反复强调,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中,这一理论范式问题依旧存在。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各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呈现的两个极端:或是停留于抽象的理论批判,或者沉溺于非批判的实证研究。从这种意义上来讲,马尔库塞关于社会变迁问题的研究,尽管存在不少理论错误和局限,但是他的探索无论在具体的理论观点方面还是在方法论方面,都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内涵。

参考文献

- [1] 马尔库塞文集:第1卷(技术、战争与法西斯主义). 高海青、冯波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马尔库塞文集:第2卷(走向社会批判理论). 高海青、陶焘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4] 马尔库塞文集:第5卷(哲学、精神分析与解放). 黄晓伟、高海青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An Analysis of Herbert Marcuse's Early Social Change Theory

Liang Meiyua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Up to now the research of Herbert Marcuse in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has been focused on his social criticism on the cultural level, for example, his theory of "one dimensional man" and "the Great Rejection strategy". However, according to a large number of newly published documents that Marcuse did not publish before his death, Marcuse's critical theory of society is not limited to cultural criticism, instead, from 1940s to 1960s, he studied and criticized modern technology and developed industrial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hange. On one hand, Marcuse has studied the social change thought in ancient philosophy, the modern rationalism social change theory, the social change theory of the modern sociology, especially Karl Marx's social change theory. On the other hand, he profoundly reveals the comprehensive reshaping of the developed industrial society by modern technology, the impediment of the developed industrial society to social changes, and the possible ways to activate the liberating potential of technology and to promote the profound changes of the developed industrial society. Marcuse's early social change theory has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 for us to grasp the Frankfurt School's social critical theory more comprehensively, especially to further enrich and develop Karl Marx's social history theory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

Key words Herbert Marcuse; social change; modern technology; developed industrial society

■ 收稿日期 2021-08-25

■ 作者简介 梁美妍, 哲学博士, 黑龙江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2。

■ 责任编辑 涂文迁